

# 卡特政府對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認知與因應

● 李桂峰、薛鵬程

**摘要：**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是美國卡特 (James E. Carter) 政府面對的一場重大國際衝突。本文通過對美方解密檔案的解讀，深入分析卡特政府在戰爭不同階段的認知與舉措。與目前多數相關研究成果的論述不同，本文認為基於國內政治、美蘇關係和中美關係的考慮，在中美兩國剛實現關係正常化之際，卡特政府並不希望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懲罰」越南。1979年初鄧小平訪美期間，卡特政府力圖通過各種外交舉措勸阻中國「教訓」越南。戰爭爆發後，在確保美國不直接軍事捲入的前提下，卡特政府確立了限制蘇聯軍事捲入和中美關係受損最小化等目標。為達成目標，卡特政府採取了在國際社會將中國從越南撤軍與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聯繫起來、按計劃推進中美關係發展、向蘇聯傳遞希望其自我約束的信息等舉措，使得自己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不過，為展示自身對提升中美戰略關係的意願，卡特政府在戰爭期間曾經向中方提供蘇軍動向的情報資料。卡特政府這一姿態無疑符合中國的心理預期，有利於其從容對越開展「懲罰」行動。

**關鍵詞：**卡特政府 「對越自衛反擊戰」 中美關係 美蘇關係 印度支那地區

1979年2至3月間的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也稱為「中越邊境戰爭」)是繼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也稱為「中印邊境戰爭」)之後又一場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邊境安寧而進行的大規模軍事鬥爭。自「對越自衛反擊戰」以來，國內外學界就原因探尋、過程梳理、得失評判、影響分析以及該戰爭決策過

\* 本文係2019年度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利益博弈視角下的中美關係研究(1972-1979)」(項目編號：19CDJJ01)、2017年度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計劃一般項目「台灣問題與20世紀70-80年代中美戰略互信之關係研究」(項目編號：J17RA075)的階段性成果。

程解讀等方面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著述<sup>①</sup>。稍顯不足的是，國內外學界較少就美國政府對這場戰爭的認識與反應進行探討。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國外學者一般要麼認為卡特 (James E. Carter) 政府為中國「懲罰」越南「開了綠燈」，要麼認為卡特政府「允許中國人做他們認為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sup>②</sup>。而中國學者則多強調卡特政府雖對中國形式上有批評，但實際上是幫中國忙<sup>③</sup>。以上著述多依賴於總統卡特、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等當事人的回憶錄，對問題的論述要麼與事實有一定的出入，要麼論述相對簡單。即使部分利用了最新檔案文獻對卡特政府的立場進行論述的成果，也依然存在一些具體史實不清的問題<sup>④</sup>。故本文根據2013年以來公開出版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的「中國卷」、「蘇聯卷」、「東南亞與太平洋卷」<sup>⑤</sup>，以及美國「數字化國家安全檔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和「美國解密檔案在線」(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等數據庫中的相關檔案文獻，試就卡特政府在這場戰爭的不同階段的認識、考慮及其採取的應對措施等進行全面、深入和系統的解讀，以求教於方家。

## 一 鄧小平訪美前夕：卡特政府力阻中國「懲罰」越南

「對越自衛反擊戰」是1976年越南統一以來中越關係惡性發展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後，在越南抗法和抗美戰爭中給予越南巨大援助，兩國關係十分緊密，但越南統一後，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因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區推行霸權主義和不斷在中越邊境挑釁而發生變化。不過，直到1978年雙方的矛盾和衝突並沒有公開化。1978年夏天，越南共產黨召開四屆四中全會，將中國視為「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和「新的作戰對象」<sup>⑥</sup>，中越衝突隨之公開化。有鑒於越南不斷在中國邊境進行武裝挑釁和侵入中方領土，早在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召開會議討論中越間緊張局勢之際，與會者均贊成採用軍事打擊的方式應對越南的挑釁<sup>⑦</sup>。只是，當時的建議沒有立即被中央所採納。不過，隨着事態的發展，12月7日中央軍委開會決定發起一場旨在「教訓」越南的有限戰爭。8日，中央軍委命令廣州和昆明兩個軍區開始準備軍事行動反擊越南<sup>⑧</sup>。一直到鄧小平訪美(下詳)前，中國雖沒有最終確定發起對越「懲罰性」反擊的時間，但準備工作一直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在中國正式決定「懲罰」越南前，卡特政府已經認識到中越關係的急速惡化。美國情報機構傾向於認為中越間對抗的直接原因是「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邊界衝突」，並判定「中越之間進行地方性的軍事摩擦可能性很大，但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sup>⑨</sup>。然而，隨着中國軍事準備工作的展開，12月29日美國情報機構第一次發現了「中國軍隊在南方實質性部署的跡象」<sup>⑩</sup>。1979年1月5日，美國情報機構形成了關於中越之間發生戰爭可能性的第一份「警惕備忘錄」。該備忘錄認為，中國因「未能預先阻止越南對柬埔寨的侵略，使其聲譽和國家安全利益遭受重大挫折」，故「可能感到被迫採取切實的措施證明

自己反對越南霸權主義進一步擴張的決心，維護自身作為一個亞洲大國的可信性」；「中國人將支持柬埔寨的抵抗力量，希望讓越南陷入耗費和持久的戰爭」。至於進一步行動，中國「可以選擇像1962年對印度做的那樣，在邊境地區開展強有力行動顯示自己的力量」<sup>⑪</sup>。

1月19日的「警惕備忘錄」雖認為中國「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有強大的政治阻力」，但表示「中國持續在中越邊境進行軍事部署的方式、時間和多種軍事力量的捲入，預示那是進攻的準備，而不是預防性的準備。中國很明顯正在完成軍事部署和宣傳攻勢，使他們能夠在自己選擇的時間採用軍事力量打擊越南」。如果「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打擊越南，將避免與越南陷入持久的衝突」，最可能的選擇是像1962年中印衝突那樣，「在時間和地域上有限深入越南領土後相對迅速地撤軍」。至於採取行動的時間，備忘錄認為中國「能在任何時候發動攻擊，甚至在鄧小平到達美國之前」<sup>⑫</sup>。25日，在一份為國務院召集「印度支那一中國—蘇聯」會議提供的背景文件中，美國情報機構在分析了中國四種可能的選擇後進一步判定，「為了應對越南的挑釁，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走一部分軍隊，向世界展示中國抵制蘇聯的擴張和霸權主義」，「中國可能被迫決定懲罰越南」<sup>⑬</sup>。

以上的「警惕備忘錄」和各種情報分析表明，美國情報機構對於中國準備中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起因、動機、限度和可能的時間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判斷。這些都有助於卡特政府決策者了解當時的狀況，做出較為合理的決策。應該說，情報機構的相關分析也確實受到卡特政府決策者的重視。1979年1月16日，在一次由國務院人員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組成的「東—西計劃組」關於印度支那問題會議上，與會成員一致認為，「為了避免紙老虎『綜合症』，中國採取堅決行動反擊越南的壓力是相當大的。時間可能是鄧小平訪美結束後的某一時間點」<sup>⑭</sup>。同時，與會成員認為「避免中蘇兩國在印度支那的對抗升級，符合美國的利益，以免給中國及東西方關係帶來負面影響」<sup>⑮</sup>。25日，布熱津斯基給卡特的備忘錄認為，在即將到來的鄧小平訪美會談中如果涉及到越南問題，中國將會力圖使美國承諾採取強硬的反越立場，或許甚至在美國明顯的默許下打擊越南<sup>⑯</sup>。26日，國務卿萬斯(Cyrus R. Vance)在給卡特的備忘錄中認為，鄧小平訪美「將尋求美國對越南人及他們最近入侵柬埔寨行動的敵視最大化」，只是美方「不確切知道中國會否採取軍事行動反對越南」<sup>⑰</sup>。

總體上，卡特政府高層認為，中國在中美關係剛完成正常化不久就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上面提及的「印度支那一中國—蘇聯」會議背景文件認為，「中國的行動會使美國國會和民眾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影響產生懷疑，削弱卡特政府能夠從鄧小平訪美中獲取的利益」，「中國的行動將削弱美國聲稱的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理由」。因為，卡特政府「在向國會和民眾闡釋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時，認為這將有助於提升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中國由於致力於實現現代化，不會在近期內在台灣問題上訴諸武力」；「如果中國對越南採取行動，美國國內特別是國會內部的親台勢力可能大力鼓譟，聲言如果中國能夠攻擊越南，為何不會在隨後攻擊台灣呢？這會使得卡特政府向國會提交的有待審議的『台灣交往法案』遭遇困難，而親台派希

望以某種形式維持《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支持率會上升」。此外，「中國如果攻擊越南，越南則有可能向與之有條約關係的蘇聯求援，這有可能打開蘇聯在越南尋求軍事基地的大門」<sup>19</sup>。這是卡特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情景。

因此，鄧小平訪美前卡特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力圖阻止中國以武力「懲罰」越南。在卡特政府看來，中國急於「教訓」越南是因為其入侵柬埔寨；故預防中國打擊越南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為此，美國通過外交途徑從多個方面向越南施壓。首先，通過法國和泰國等途徑接觸越南，直接勸說他們從柬埔寨撤軍。當越南表示中國應當為局勢緊張負責時，卡特政府則回敬道，「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才是地區緊張局勢的直接原因」<sup>19</sup>。其次，推動聯合國大會（聯大）通過相關決議，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卡特政府聯絡近二十個國家，希望能夠在安全理事會或聯大進行投票，通過相關決議譴責越南；只是由於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國家和不結盟運動國家存有疑慮，沒有國家站出來要求召開一次聯大會議。再次，力圖利用阻斷經濟援助來迫使越南讓步。卡特政府接觸越南的主要援助國，特別是不結盟運動成員國，引導其中的一些國家支持在雙邊或者多邊情況下凍結對越南的援助。美國的要求得到了部分國家的認可。在鄧小平訪美前，有八個國家同意取消或者減少對越南的援助<sup>20</sup>。最後，力圖讓蘇聯約束越南。卡特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告知蘇聯，希望其能夠讓越南保持克制。不過，蘇聯給美國的答覆是「沒有越南軍隊在柬埔寨」<sup>21</sup>。

同時，美國通過直接或者間接渠道要求中國方面保持克制。首先，通過中國駐美聯絡處和美國駐華聯絡處直接對中國進行勸說。在美國領導人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時，曾兩次要求中國保持克制。柴澤民答覆美方，在越南不斷挑釁的情況下，越南「將會自食其果」。在北京，美國通過駐華聯絡處告知中國，除了軍事行動之外還有別的選擇，如通過中止援助、聯合國行動等向越南和蘇聯施加壓力，這樣能夠維持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廣泛支持。美國可以繼續支持中國，與中國密切合作。中國的軍事行動會使得國際社會情緒發生轉變，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影響產生懷疑。其次，卡特政府聯絡主要的西方盟國和日本等，向他們表明自己對中國軍事部署的關注，要求他們接觸中國，讓中國在中越邊境保持克制<sup>22</sup>。

此外，為了防止中國確實在某一天「教訓」越南，誘發國內輿論喧嘩以及國會的批評，卡特政府在鄧小平訪美前還主動與國會關鍵領袖進行協商，以獲取他們對事件的看法。不過，一些國會參議員的反應並不樂觀，他們認為如果中國對越動武，將會影響到中美關係的相關立法。如參議員丘奇（Frank Church）就表示中越邊境衝突的重大升級，會嚴重侵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收益，影響相關立法。如果中國發起重大軍事行動，將使得以某種形式維持美台條約的支持率升高<sup>23</sup>。

總體上，鄧小平訪美前卡特政府已經認識到中國有極大可能通過軍事行動「懲罰」越南，也採取了一些行動力圖阻止。但是，卡特政府採取的各種行動既不能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也無力改變中國「懲罰」越南的決心。所以，在中國還未用武力「教訓」越南前，卡特政府只好將希望寄託在鄧小平訪美之行，勸說中方保持克制。



## 二 鄧小平訪美期間：卡特政府勸說中方不要對越動武

鄧小平訪美是中美建交談判期間雙方協商的結果。中美建交談判後期，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與美方談判代表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 會談時表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後將會訪問美國。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後，經雙方協商，最終確定鄧小平於1979年1月底、2月初訪美。在鄧小平訪美前，中美雙方都認識到越南是兩國高層會談無法迴避的問題。對中國來說，在1978年11月蘇聯和越南簽訂具有軍事政治性質的條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的情況下，「懲罰」越南不能不考慮其背後的蘇聯。中方希望通過向美方陳述自己在中越關係上的立場來獲得美國對其「教訓」越南的理解和支持，以此來牽制蘇聯。這也就是鄧小平訪美期間中方要求在《聯合新聞公報》中提及反對「霸權」的原因<sup>24</sup>。而卡特政府則希望利用這一機會打消中國對越動武的念頭。

鄧小平訪美前，卡特政府內部就越南問題的會談內容和相關策略逐步統一了意見。1月25日的「印度支那—中國—蘇聯」會議背景文件稱，如果中國在鄧小平訪美前沒有對越南採取行動，希望卡特與鄧小平會晤時以越南作為重要議題。同時，文件反映美方希望鄧小平「在國會和其他公開場合解釋中國的越南行動」，「對越南和台灣做明確的區分」。文件還建議，如果中國的行動始於訪問前或者訪問中，卡特政府應「考慮調整鄧小平的行程，特別是流露出不滿迹象」，以之拉開美國與中國行動的距離。不過，從文件可見美方「不希望阻礙鄧小平的訪問，以任何形式讓蘇聯受益」<sup>25</sup>。同日，在一份為卡特準備的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中，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的目標是「阻止中越之間的軍事衝突」。由於認識到美國對中國行動的影響力有限，布熱津斯基建議通過向鄧小平表達以下三點來對中國施加一定的影響：第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美國將就印度支那問題與中國和日本進行協商；第二，「中方輕率採取行動會使得亞洲的合作非常困難」；第三，「如果越南不從柬埔寨撤軍，美國就不會承認它」<sup>26</sup>。

1月26日，在萬斯、布熱津斯基、國防部部長布朗 (Harold Brown) 和中央情報局 (CIA) 局長特納 (Stansfield Turner) 等人參加的會議上，針對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國在中越邊境地區進行軍事部署的形勢，與會者一致建議美國政府採取如下三項措施：第一，繼續對越南施加國際壓力，阻止所有援助國向其提供援助，直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第二，明確告訴蘇聯，希望其能夠保持克制，不要在越南尋求軍事基地，或者利用金蘭灣的海軍基地。第三，告知中國，美國在勸說其他國家不給予越南援助方面所做的努力被證明是成功的；中國軍事上反擊越南將損害美國正在採取的在國際社會孤立越南的行動。萬斯等人特別建議在卡特與鄧小平的會談中應該提及這三點<sup>27</sup>。同日，萬斯建議卡特「向中國人表明美國強烈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但不會支持中國在這一地區導致戰爭擴大和升級的行動」。在萬斯看來，如果中國在鄧小平訪美後不久攻擊越南 (萬斯認為極有可能)，美國將被認為捲入了這一行動。萬斯還認為中國攻擊越南的行動，會更加弱化卡特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與國會討價還價的地位。因為卡特政府對外宣稱中美關係正常化有利於太平洋地區的

穩定與和平，希望避免喚起人們關於攻擊台灣的印象<sup>⑳</sup>。從後來鄧小平訪美期間雙方高層會談內容來看，萬斯和布熱津斯基等人勸說中方不要對越南動武的建議及其依據均為卡特所接受。

根據既定安排，鄧小平如期訪美。訪美期間，鄧小平與卡特等人在1月29日上午、下午和30日上午就越南問題進行了三次會談。29日上午的會談中，鄧小平提醒美國應該更全面地評估越南的角色。鄧小平視越南為「百分之百的東方古巴」，越南有五千多萬人口和一支規模較大的軍隊，「如果中美雙方不注意這一點，越南的角色將會大大超過古巴」。在他看來，越南通過與蘇聯簽訂具有軍事意義的條約，正在推進蘇聯所謂「亞洲安全體系的夢想」<sup>㉑</sup>。此次會談主要是鄧小平陳述中方的看法，卡特等人沒有就相關問題闡釋自己的立場。

1月29日下午會談開始後，卡特介紹了美國為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採取的鼓勵其他國家減少對越南的外交援助、不尋求與其關係正常化，以及增加對泰國的軍事援助等一系列措施<sup>㉒</sup>。鄧小平則更全面地介紹了中方對越南和蘇越關係的認識、越南對中國的挑釁以及中國可能採取的舉措等。首先，鄧小平告知卡特等人，越南想建立的所謂「印度支那聯邦」不僅僅限於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國，甚或泰國也在其野心範圍之內。對鄧小平來說，越南將會更深地投入到蘇聯的懷抱，「正在扮演古巴的角色」，是蘇聯推進所謂「亞洲安全體系」的重要因素，正在被蘇聯利用來困擾中國<sup>㉓</sup>。其次，鄧小平詳細談及越南的挑釁行為和中國的打算。他指出越南人天天給中國製造麻煩，致使邊境事件和小規模的衝突不斷，「如果不懲罰越南，它的挑釁活動將不斷升級，邊境事件會持續不斷和變得更大」<sup>㉔</sup>。同時，鄧小平認為，「柬埔寨正在遭受越南侵略之際，袖手旁觀是不對的」，「如果任由越南肆無忌憚地自行其是，東盟國家將會發生變化，容易讓伺機擴張的蘇聯『鑽空子』」，而在限定的短時間內給予越南一定的「懲罰」能對其野心起到「一定的約束性



鄧小平訪美期間與卡特等人就越南問題進行了三次會談。（資料圖片）

作用」，故鄧小平表示中國打算「教訓」一下越南<sup>③</sup>。針對美國對蘇聯干預的擔憂，鄧小平表示「如果說蘇聯不做反應是不可信的」，但認為其不會做「大的反應」。他還強調，中方已經考慮了蘇聯反應較大的可能性，並表示中國不怕。不過，他也認為，「我們必須考慮最壞的可能，即使他們增加了軍隊數量，我們也能應付」。鄧小平希望美國對中國的行動在國際社會予以「道義支持」<sup>④</sup>。對於鄧小平的陳述，卡特表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不僅你們面臨北方〔蘇聯〕的軍事威脅，也面臨國際社會態度轉變的問題」<sup>⑤</sup>；如果中國對越南採取行動，「世界的態度將由反對越南，變成部分地支持越南」。卡特強調美國「很難鼓勵暴力」，但表示可以向中國提供有關蘇聯的情報簡報<sup>⑥</sup>。

1月30日會談中，卡特認為中方「懲罰」越南「將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卡特的理由有九點：其一，如果中國行動的目標之一是阻礙越南在柬埔寨的侵略行動，那很難成功。因為「一次象徵性的行動不會被視為是有意義的『懲罰』」。其二，對越南採取行動，會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平形象和越南侵略者的形象發生變化」。其三，從長遠來看，聯合國和世界範圍的譴責會發揮作用。工業化國家正在取消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而不結盟運動國家則正在聯合國採取行動，發起對越南的制裁。其四，中國「懲罰」越南是「一場嚴重的事件」，「有可能升級成地區衝突」。其五，對越南採取行動後，如果中國收到（來自蘇聯的）最後通牒，中方可能不得不放棄短暫和有限的行動計劃。其六，「懲罰」越南「將引發美國國內對中國國家角色和將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產生嚴重關注」。其七，「作為游擊戰士，柬埔寨人看起來比預期做得更好」，言外之意是中國無需採取行動。其八，中國「在邊境地區的威脅足以給越南製造麻煩，甚至無需突入越南境內」。其九，中國的「行動或許會給蘇聯在越南尋求長久的存在製造藉口」，故卡特稱「美國不能支持這樣的行動」，並要求鄧小平不要同意「懲罰」越南<sup>⑦</sup>。

對於卡特的要求，鄧小平強調「必須給越南一個教訓」<sup>⑧</sup>。鄧小平認為，「如果越南覺得中國軟弱，形勢將更加惡化」。他承諾行動只會「持續十至二十天，隨之就撤退」。至於國際社會的反應，鄧小平表示中國政府高層已經全面考慮過這一問題，認為最初的反應可能是否定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反應將變得肯定<sup>⑨</sup>。

訪美期間，出於鞏固戰略關係的需要，中美雙方關於越南問題的會談是坦誠的。鄧小平向卡特等人表示了「教訓」越南的決心；卡特政府則極力勸說鄧小平不要採取軍事行動「懲罰」越南，並闡明了自己的理由。應該說，中方對鄧小平訪美期間就越南問題的會談結果是滿意的。畢竟，中方本來的期許就不甚高，只是交換建議，期望美方給予「道義支持」。卡特政府則承諾提供蘇聯有關情報，向中方表明美國不會因為中國可能的行動影響雙邊戰略合作關係。中方認識到卡特政府展現出的提升中美戰略關係的意願。

通過鄧小平訪美會談和美國情報機構的評估，卡特等人認為中國「懲罰」越南只是時間問題，因此不得不作出隨時會面對中國「教訓」越南局面的考慮。2月6日，布熱津斯基在給卡特的備忘錄中表示是時候「嚴肅考慮對中越之間敵對的反應了」。布熱津斯基向卡特提供了三種選擇，並逐條分析它們的

優劣。第一種選擇是美國可以「明確地或者戰術性支持中國的行動」。不足之處在於這使得美國處於直接對抗蘇聯的境地，並讓人懷疑中國的行動是和美國一起策劃的。第二種選擇是美國「明確譴責中國」。這樣美國「將加入蘇聯和其他國家在聯合國譴責中國，要求他們撤軍」，這一立場會給正在發展的中美關係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並使得美國站到了蘇聯一邊。如果美國支持蘇聯，更為負面的結果是蘇聯可以抽出手來更從容對付中國，蘇聯可能抓住這一機會對中國採取直接的行動。第三種選擇是美國「要求從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外國軍隊」。這一選擇「結合聯合國已經要求的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希望中國從越南撤軍」。布熱津斯基認為，「這一辦法的優點在於不會使得美國在外部看來容忍侵略行動，但也不會使得中國因為被譴責而處於孤立境地，同時也不會讓蘇聯為所欲為」。布熱津斯基分析指出，「這一方法能夠獲得一定的國際支持，並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是站得住腳的」。最後，布熱津斯基強調：「從更廣泛的立場來看，我認為需要對越南施加一定的束縛，向蘇聯人表明其代理人戰爭不是不受約束的。當我們做出自己的反應的時候，應該將這一戰略目標記在心中。」<sup>④②</sup> 布熱津斯基本身傾向於第三種選擇。在他看來，越南完全不會接受從柬埔寨撤軍，第三種選擇使得美國能夠對中國的行動採取有偏向性的外交政策，又不至於讓人將之與卡特政府聯繫起來<sup>④③</sup>。

### 三 戰事期間：卡特政府要求中越同時撤軍

自1978年12月初決定「懲罰」越南後，中方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到鄧小平在訪問美國和日本歸國後，反擊越南的時機已經成熟。1979年2月15日，鄧小平通過中國駐美聯絡處向卡特政府轉達口信，稱因現在中越邊境的形勢更加惡化，中國被迫決定採取必要的防衛措施反擊越南：「鑒於中美兩國對該地區有共同的關注」，希望獲得卡特總統和美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sup>④④</sup>。

收到中方信息後，正在墨西哥訪問的卡特指示副總統蒙代爾 (Walter F. Mondale) 組織相關部門負責人召開特別協調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起草了一份給鄧小平的答覆，經卡特等人同意後傳遞給中方。該答覆表示，「在這一時候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將是一個錯誤，會把世人的目光從越南和蘇聯在柬埔寨的行動上引開。現在不應該做任何削弱正在加強的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國際壓力」，中國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將增強蘇聯在東南亞的影響，擴大其存在，並會給印度支那地區及其以外的地區帶來不確定性和危險的後果」。美方希望中方「不要採取任何不僅會在亞洲引發嚴重問題，而且會在美國國內帶來新困難的行動，這只會使得其他國家受益」。如果中國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美方在公開聲明中「沒有選擇，只能反對這樣的行動。美國政府將批評任何在自己的領土以外動用武力的行為，要求越南立刻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sup>④⑤</sup>。從這一答覆來看，卡特政府選擇了布熱津斯基建議的第三種選擇。不過，這無法阻擋中國「懲罰」越南的步伐。2月16日（北京時間17日），中國正式發起了為期十六天的「對越自衛反擊戰」。



## (一) 給蘇聯的聲明和美國的公開姿態

2月16日下午，從墨西哥歸國的特召集蒙代爾、萬斯、布熱津斯基、特納、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人參加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了給蘇聯的聲明和對中國軍事行動的公開姿態等問題。會議前，布熱津斯基已經派人起草了一份給蘇聯的聲明草案。圍繞草案，與會人員就其內容和傳遞信息的方式進行了討論。針對奧克森伯格為何要給蘇聯發信息的詢問，萬斯指出：第一，「消除有關美國捲入衝突的任何質疑」；第二，「提供指導美國政策的框架，希望避免蘇聯的誤算」。草案建議告知蘇聯，「如果其有所克制，這會使得美方也有所克制」。卡特對這一模式提出疑問；國防部的艾倫(Lucius Allen)將軍想知道這一模式會否限制美國必須進行的偵查活動，是否會將美國限制在菲律賓的蘇比克(Subic)？萬斯認為這一模式實際上對美國沒有約束力。國防部的史密斯(William Smith)將軍詢問美方「克制」承諾的效用是甚麼，以及美方打算克制甚麼？鑒於卡特等人對相關表述的質疑，與會人員考慮採用「如果蘇聯自己保持克制，我們將有類似的行為」的表述，但卡特表示「這不是我們的立場」。卡特強調：「我們的目標不是軍事捲入，也不是因為衝突而擴大自己在東亞的基地結構。但要約束蘇聯。我們應該能夠保持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也給蘇聯一些甜頭。」<sup>④④</sup>

霍爾布魯克認為美方的姿態應該是：「如果蘇聯人在應對危機的時候甚麼都不做，美國也將甚麼都不做。如果他們做甚麼，我們也做甚麼。」他強調美方的聲明必須傳遞這一意思。布熱津斯基建議信息的言詞考慮「我們要求蘇聯保持克制的影響」這一點，表示「我們將準備合作尋找解決衝突的方案」，這一模式被與會者所接受。助理國防部部長唐肯(Charles W. Duncan)建議刪掉「越南和它的支持者必須與中國一起分擔這一形勢的責任」這句話中「和它的支持者」這一部分。他認為「沒有必要在蘇聯眼前指指點點，他們知道我們的立場」，該建議被接受。萬斯問這一信息是否以總統致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信息的形式發出，卡特表示「這是自己所期望的」。另外，布熱津斯基建議用“object to”(反對)中國的行動，而不是“oppose”(反對)。在他看來，在俄語中“oppose”有行動的含義。如果用這一詞彙，可能鼓勵蘇聯採取大膽行動「反對」中國<sup>④⑤</sup>。不過，此次會議沒有能夠就給蘇聯的聲明作最後定稿。

此後，卡特等人討論了針對中國「懲罰」越南所要做的公開聲明。卡特政府針對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第一次對外聲明草案幾乎沒有經過爭論就被認可，並於2月17日由國務院發言人哈丁·卡特(Hodding Carter III)予以公布。聲明稱：「美國政府在東南亞尋求一個和平與穩定的獨立國家體系，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對任何在自己領土之外使用武力的行為持批評態度。……我們要求越南和中國立即分別從柬埔寨和越南撤走自己的軍隊。我們已經聯繫過中國、越南和蘇聯，呼籲他們保持克制。我們將繼續這樣做。」<sup>④⑥</sup>很明顯，這樣的表述是遵循了前述布熱津斯基提供的第三種選擇的模式。此後，將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聯繫起來，同時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成為卡特政府對外闡述的基本立場。

2月16日會議後，卡特到戴維營(Camp David)休假。處理中越衝突的問題就留給蒙代爾、萬斯和布熱津斯基等人參加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17日，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再次討論了美國對衝突的公開立場與聲明、給蘇聯的信息等問題，同時研究了美國在聯合國應採取的立場。關於針對戰爭的對外聲明，與會人員主要考慮如何應對新聞媒體可能會提及的各種問題。例如，當被問及「鄧小平在美國的時候提出過攻擊越南問題嗎？」與會人員認為應該回答「沒有」。當被問及政府「與蘇聯人取得聯繫了嗎？」與會人員認為應該答覆「將在不久後與蘇聯聯繫」。至於被問及戰爭會否影響中美關係，所有人同意答覆應該是「我們沒有準備好給予立即回答」。與會人員建議卡特政府應該迅速與新聞媒體接觸，正確地闡釋政府的立場，以便影響那些撰稿人<sup>④</sup>。白宮新聞發言人鮑威爾(Jody Powell)表示，應當主要針對鄧小平訪美期間是否提出反擊越南和美方是否力圖阻止中方對越動武兩個問題，盡早講出自己的故事。總統助理喬丹(Hamilton Jordan)建議卡特政府當天「從《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有選擇地找來記者，給他們背景信息，以便他們明天能夠準確報導政府的立場，影響接下來撰稿人對事件的描述」。基於這一建議，同日萬斯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格爾茨曼(Bernard Gwertzman)談話時就卡特政府的決策做出了六點說明。這六點是：「一、美國將不會直接捲入亞洲共產主義國家間的衝突；二、美國當前的利益並沒有受到中越間的戰鬥影響，但衝突的擴大化是危險的；三、美國將利用能夠採用的方式——外交、政治和道義——鼓勵克制，防止爆發一場蘇聯捲入的戰爭；四、現在的衝突並沒有危及美國亞洲盟友的安全，但是美國將關注對該地區穩定的任何威脅，並與地區盟友緊密協商；五、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是已經完成的事實，不會因為最近的衝突而改變；六、美國將與其他國家一起尋求越南軍隊立即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反對其他國家干涉別國內部事務。」<sup>⑤</sup>與會者還認為，應當避免讓事件看來是情報工作的失敗<sup>⑥</sup>。會議決定所有的新聞問題將由國務院答覆，而不是白宮，也不是國防部<sup>⑦</sup>。

對於給蘇聯的信息，在2月16日討論的基礎上，萬斯覺得採用「美國政府準備展示同樣的克制」這一句值得思考。萬斯認為，「這預示着要麼美國潛在的捲入，將導致國會和蘇聯批評；要麼放棄美國的選擇，將導致國會內部另外四分之一人的批評」。布熱津斯基建議替換「克制」一句，改用「美國準備就實現和平的努力合作」。同時，與會成員也討論了「誰」來克制的問題。為了消除模糊，「所有各方」(all parties)被插入信息中<sup>⑧</sup>。至此，經過不斷討論和修改，最終形成了17日以卡特的名義發給勃列日涅夫的信息。信息首先表明，「美國政府強烈支持用非武力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中國今天的行動與越南入侵柬埔寨一起，嚴重動搖了這一原則」，因此，美方「已經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強烈反對他們採取的行動，要求他們立即從越南撤軍，正如我們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一樣」。其次，信息闡明美國「在亞洲尋求一種由獨立國家構成的穩定與和平的結構。越南在最近幾個月對柬埔寨的入侵嚴重削弱了這一結構，直接導致現在的危險局勢」，「越南必須與中國一道共同對當前的形勢負責」。最後，信息認為，「當前的形勢需要我們兩國政府的理智與克制，以防止任何擴大衝突，以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卡特政府希望蘇聯不要採取惡

化形勢的行動，如部署陸軍或海軍到越南港口和基地（如金蘭灣），等等。在卡特政府看來，「只有當所有各方保持克制時，當前形勢所蘊含的危險才能夠有所改觀，地區和平才能夠恢復。美國準備就這一實現和平的努力合作」<sup>⑤2</sup>。

至於美國在聯合國的立場，萬斯認為最好是讓別的國家先提出議案，在議案被討論的時候，美國再採取適當的行動和戰術。布熱津斯基詢問：如果聯合國提出一個只是譴責中國，而不譴責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議案，美方會如何投票？與會人員推斷到時最少會有兩個議案被提出，這樣美方可以修正它們，避免面對是否投票譴責中國這樣的直接選擇。至於與盟友協商的問題，萬斯認為聯合國是與歐洲和日本盟友協商的最理想場所<sup>⑤3</sup>。

2月18日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主要討論了是否就中越衝突再次發表公開聲明，如何應對蘇聯的威脅性活動，以及是否提升美國對事態的偵察能力等問題。霍爾布魯克認為17日萬斯與格爾茨曼談話時的六點說明很有效。會議決定卡特政府不需要對自己的立場再做額外的聲明，可以使用萬斯與格爾茨曼會談的要點<sup>⑤4</sup>。對於蘇聯的威脅性活動，布熱津斯基詢問：如果蘇聯對中國構成更大的威脅，美國如何回應？萬斯表示自己關注的是蘇聯可能派遣志願飛行員到河內。布熱津斯基認為蘇聯可能在金蘭灣尋找基地<sup>⑤5</sup>。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總統副助理阿隆（David Aaron）認為如果那樣，美國將不得不重新評估與蘇聯的安全關係。布熱津斯基認為，對於蘇聯對中越衝突的可能反應範圍以及美國對蘇聯每一個可能行動所做的應對，應該進行研究，以便提供給19日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討論。奧克森伯格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阿馬科斯特（Michael H. Armacost）等人被安排負責起草相關文件。對於美國是否需要提升偵查能力，以便掌握越南的戰術形勢的問題，特納列舉了兩種選擇：派一艘有監聽功能的巡洋艦到東京灣，或者利用SR-71偵察衛星。布熱津斯基讓特納準備一份關於選擇的報告，供19日的會議討論。不過，哈丁·卡特認為美方任何增強偵察活動或者其他行為，都將背離自己對外聲稱的對於衝突沒有利益關係的說辭<sup>⑤6</sup>。

應該說，從中國打響「對越自衛反擊戰」到2月18日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因鄧小平訪美時就越南問題的會談，美方對中國行動的限度有所了解，故卡特政府更重視的是如何防止蘇聯插手戰爭並因此獲利，以及應對國內外輿論對美國與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關係的評判。基於此，卡特政府初步確定了不直接捲入戰爭、防止蘇聯插手戰爭的目標，致信勃列日涅夫希望蘇聯「保持克制」，並按照戰爭爆發前布熱津斯基的建議，在公開對外聲明中呼籲越南從柬埔寨和中國從越南撤軍。只是，這段時間裏卡特政府並沒有專門討論戰爭可能對中美關係產生的影響，以及美國如何處理此時的雙邊關係。

## （二）討論布盧門撒爾訪華與中美雙邊關係

美國財政部部長布盧門撒爾（Werner M. Blumenthal）訪華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2月19日，奧克森伯格和軍事助理奧多姆（William Odom）在給布熱津斯基的備忘錄中認為，萬斯將會盡力拖延布盧門撒爾訪華，希望布熱津斯基極力推動布盧門撒爾按期訪華。理由有四點：一是如果



伍德科克還沒有被確認為駐華大使，3月1日美國駐華聯絡處升級為大使館之際，布盧門撒爾不如期訪華，美國將沒有高級官員主持開館儀式。二是不能給予蘇聯損害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機會。三是當蘇聯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之際，美國依然堅持提升美蘇雙邊關係，這樣的政策也應該用於指導美國的對華政策。最後，如果拖延布盧門撒爾訪華，會使得卡特的對華政策顯得搖擺不定和前後不一，並遭受挫折。奧克森伯格和奧多姆建議在如期訪華的同時，可以改變訪華時間長度、更換訪華成員構成，以及採取靈活的策略表示美方對中越衝突的不滿等<sup>⑤</sup>。在奧克森伯格等人的建議下，2月19日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集中討論了美國在衝突中的目標、中美雙邊關係、在聯合國的立場，以及對蘇聯軍事捲入的應急計劃等問題，其中圍繞布盧門撒爾訪華展開的中美雙邊關係討論是此次會議的重點。

根據會議記錄來看，與會者首先詳細列舉了美國面對衝突所要實現的目標。與會人員同意在避免美國任何直接捲入的前提下，美國將會：(1) 最小化中越衝突對美中和美蘇雙邊關係的影響；(2) 阻止蘇聯將衝突升級；(3) 確保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4) 尋求一個中立的柬埔寨的出現；(5) 在此過程中安撫東盟和日本<sup>⑥</sup>。

其次，與會人員圍繞布盧門撒爾訪華問題，集中討論了中美雙邊關係。關於布盧門撒爾訪華，討論中提出了五種選擇：(1) 維持原計劃；(2) 維持原計劃，但是考慮根據形勢改變指令；(3) 延遲一周訪問；(4) 延遲訪問直到中國從越南撤軍；(5) 按照計劃訪問但以助理財政部部長卡斯韋爾 (Robert Carswell) 代替布盧門撒爾。萬斯認為如果布盧門撒爾按原來計劃訪華，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支持中國的行動，建議將訪問推遲一周。霍爾布魯克則認為應該推進訪問。在他看來，如果布盧門撒爾和伍德科克都不在北京，那麼當美國駐華聯絡處升級成大使館的時候，北京將沒有美國的高層代表；此外，取消訪問將會被解讀為美國政府承認遭受了挫折，勢將開啟一個中美關係不穩定的過程。蒙代爾認為延遲訪問對蘇越有利，堅持訪問則符合中國意願；布盧門撒爾應該訪華，但要說批評的話。布熱津斯基認為應該推進訪問，但要改變一下訪問的指令。在他看來，布盧門撒爾訪華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過程，儘管在蘇聯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剛剛發生，總統科學顧問普雷斯 (Frank Press) 還是去了莫斯科。確保布盧門撒爾訪華將帶來深化中美關係正常化和警告蘇聯的雙重好處；如果阻止訪問，只能是自我懲罰。鮑威爾認為，因為美國公眾基本上認為應該「敲打」一下越南，如果布盧門撒爾2月24日動身訪華，媒體的反應將不會太強烈<sup>⑦</sup>。最終，與會者決議延遲三十六小時決定布盧門撒爾是否繼續按照計劃訪問中國，直到中國突入越南的有限性變得更加清晰為止<sup>⑧</sup>。

再次，與會者決定授權美國在聯合國的使團，與盟友一道尋求推動安理會討論所有的印度支那問題。在與會者看來，不論中國還是蘇聯都不希望討論整個印度支那問題。中國只是希望辯論柬埔寨問題，蘇聯只是希望辯論越南問題。不過，把問題提交聯合國，以及採取平衡中國和蘇聯的立場，將確保美方獲取政治利益<sup>⑨</sup>。

最後，關於針對蘇聯軍事捲入的應急計劃，與會人員基於蘇聯直接軍事捲入中越軍事衝突和中蘇衝突的原因，認為在隨後的會議應當考慮，如果蘇聯



明顯地尋求在金蘭灣獲取海軍基地，是否在蘇聯做最後的決定前告知他們，這一行動將導致美國重新考慮自己不與中國結成軍事安全關係的立場<sup>②</sup>。

此次會議所列的目標得到卡特的認可。至於會議延遲三十六小時討論布盧門撒爾是否按照計劃訪華的決定，卡特在2月21日答覆布盧門撒爾「應該按照計劃前往北京」，並將指令直接傳達給布盧門撒爾<sup>③</sup>。2月19日的會議是卡特政府應對中越衝突的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它不僅全面梳理了卡特政府在應對危機中的目標，還就如何處理美蘇關係、中美關係和在聯合國的作為做了指導性的決議。此後，卡特政府應對危機基本上就是根據這次會議的決議，從對蘇、對華和聯合國三個方面着手來應對危機。

### (三) 從對蘇、對華和聯合國三方面應對危機

自「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後，卡特政府就十分關注蘇聯可能的動向。美國擔心蘇聯會通過軍事行動直接介入，誘發中蘇衝突，從而使得整個衝突擴大化。同時，在卡特政府看來，即使蘇聯不直接採用軍事手段干涉中越間的戰爭，它也可能利用戰爭造成的形勢力圖在越南獲取軍事基地。為防止自己預想的不良結果的出現，如前所述，卡特政府在戰爭爆發後的2月17日就以總統的名義致信勃列日涅夫，要求蘇聯「保持克制」，「不採取使得形勢惡化的行動」。此後，美蘇之間圍繞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展開了一場外交角力。針對17日卡特政府的信息，勃列日涅夫在18日的回信中反對美國將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和越南入侵柬埔寨「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蘇聯還責問美國，中國在鄧小平訪美後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難道是真的巧合？暗示美國難脫干係，又表示「不能理解為甚麼美國會要求自己保持克制」，美國應該做的是「譴責中國」<sup>④</sup>。24日，卡特政府通過助理國務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約見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Anatoliy Dobrynin），稱蘇聯官方宣傳不斷將美國與中國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決定聯繫在一起，給美國造成了很大的困難，表示「如果出現蘇聯海軍艦隊或者空軍部隊永久利用越南的設施，或者在越南出現蘇聯有組織的軍隊，美國政府將會表示嚴重關切，並迫使美國政府重新評估與該地區相關國家〔暗指中國〕的安全關係」<sup>⑤</sup>。很明顯，這是卡特政府為防止蘇聯利用戰爭在越南獲取軍事基地而發出的警告。對於美方的信息，多勃雷寧表示「這像是美國極力告訴蘇聯約束自己做實際上沒有做的事情」，「美國持續不斷地要求蘇聯不要在那兒〔越南〕那樣做」，實際上「蘇聯已經表示沒有興趣在那兒〔越南〕那樣做」<sup>⑥</sup>。3月1日，蘇聯政府告知卡特政府，「沒有比美方持續對中國打擊越南的行動缺乏明確的態度和譴責的行為更讓人困惑的了。美國不是要求中國立即停止侵略和無條件從越南撤軍，而是將北京的行動與本質上毫不相同的事情聯繫在一起。這樣的政策，無論如何偽裝，實際上只能是偏袒侵略一方，幫助北京擺脫因為發動對越南的打擊而造成的不利局面」<sup>⑦</sup>。應該說，通過這一系列的外交折衝，卡特政府明確向蘇聯傳遞了自己的信息，也足以引起蘇聯的重視。結合自身與蘇聯的信息互通，以及情報機構對蘇聯動向的分析，卡特政府認為，雖然不排

除在越南不再能夠單獨應對中國的情況下蘇聯有直接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但總體上「蘇聯明顯地相當克制」<sup>⑧</sup>。

在聯合國，卡特政府按照2月19日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的相關決定，與美國對外宣稱的立場保持一致。2月23至28日，在挪威、葡萄牙、英國和美國的聯合推動下，聯合國安理會召開了五次大會，討論東南亞地區形勢，以及恢復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等問題。在公開的辯論中，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楊(Andrew J. Young)指出，美國政府不會倒向衝突的任何一方，要求各方保持克制，並和平解決突出的問題<sup>⑨</sup>。楊建議安理會要求各方立即停火，所有外國軍隊從柬埔寨和越南撤軍，並承諾採用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同時，楊要求直接捲入的各方在行動上保持克制，尊重《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而其他的國家(暗指蘇聯)也應當保持同樣的克制，不要火上澆油，使得衝突擴大化<sup>⑩</sup>。

對於中美關係，根據2月19日會議的決定，卡特政府一方面通過與中方接觸表明自己的立場，並希冀獲取相關信息全面了解中國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布盧門撒爾訪華，推進兩國關係，鞏固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成果。在20日同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的談話中，萬斯指出卡特政府不能接受中國以越南的挑釁性行動作為對其動武的理由，美方不會倒向衝突的任何一方，希望看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同時中國從越南撤軍。萬斯認為，中國對越南使用武力會使得更不容易與之打交道，讓本來已經十分危險的形勢更趨惡化，並讓蘇聯更深地捲入東南亞地區。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際，美國曾多次警告蘇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促使越南撤軍，並要求蘇聯自身保持克制，不利用形勢向越南引入軍事力量。不過，中國的行動使美國對蘇聯的影響變得更困難。萬斯還特意提及中國「教訓」越南可能對鄧小平訪美期間給美國公眾留下的好印象產生負面影響，影響公眾和國會對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認知，使得國會內的強硬派在與台灣有關的立法中加入強硬的語言。此外，萬斯表示雖然了解中國政府公開聲明無意永久佔領越南領土，一旦中國現在的行動結束將迅速撤軍，但希望柴澤民能夠給予更多關於中國目的的信息<sup>⑪</sup>。在2月21日給中國駐美聯絡處副主任韓敘送別的宴會前，奧克森伯格建議布熱津斯基向其表明，中國「教訓」越南將危及中國通過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誘發中蘇衝突，甚或危及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同時，奧克森伯格建議布熱津斯基表示美方將會在公開或私下表明自己的立場。通過雙方的交流以及相關的情報蒐集，卡特政府判定中國的對越行動正如鄧小平訪美期間所說，在範圍和時間上是有限的<sup>⑫</sup>。卡特政府認為中國想將衝突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防止蘇聯直接干預，因此中蘇直接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大。

在對戰爭形勢和中方目的有了較為明確的判斷後，卡特政府如期安排布盧門撒爾訪華，鞏固兩國關係正常化成果。根據2月19日會議的決定，卡特政府在給布盧門撒爾的指令中要求其「清楚地表明美國反對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以及「私下裏強調美國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也反對中國突入越南境內」；同時，布盧門撒爾也應該指出衝突的代價，「一是損害正常化的進程，引發公眾對中國是一個穩定和適合做生意的地方的懷疑；二是有可能為蘇聯在印度支那地區擴張自己的勢力提供機會；三是冒中越和中蘇衝突持久化的風

險；四是侵蝕中國一直堅持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的原則」。不過，該指令也表示布盧門撒爾應該告訴中國，美國的「目標是鼓勵越南和中國撤軍，阻止蘇聯捲入衝突」。美國「不同意中國的行動」，但將極力「最小化中越衝突對中美關係的破壞性影響」<sup>③</sup>。現有檔案顯示，布盧門撒爾訪華期間，基本上就是按照以上指令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sup>④</sup>。

不過，向中方表明美方對中越衝突的立場只是布盧門撒爾訪華議程中的一個環節，甚至不是很重要的環節。對卡特政府來說，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已經是既成事實，它不會允許中越之間的衝突影響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鞏固。布盧門撒爾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進行期間訪華，無疑也證明了這一點。布盧門撒爾訪華後，隨着3月5日中國宣布完成對越「懲罰」任務並開始撤軍，中越衝突不再是卡特政府關注的重點。

## 四 結語

綜上，與現有的很多研究成果表述不同，我們可以發現從中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籌備階段到整個戰爭期間，卡特政府基於國內輿論、美蘇關係和中美關係的考慮，都不希望中國通過軍事行動「教訓」越南。但是，當面對戰爭現實的時候，卡特政府既不想國內民眾和國會中對中美關係正常化存有異議的議員對美國與該戰爭的關係產生質疑，也不想因自身對中國行動做出強烈反應而影響兩國戰略關係的提升，更不想蘇聯從中漁利，伺機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所以在公開場合將柬埔寨問題和越南問題聯繫起來，呼籲兩國同時撤軍。同時，為防止蘇聯利用中越衝突獲取戰略利益，展現自己對中美戰略關係的重視，卡特政府在衝突期間通過布熱津斯基與柴澤民會晤這一渠道，向中方提供有關蘇聯軍事動向的情報。應該說，美國的行為是符合中國領導人心理預期的。正如1979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以普雷斯為團長的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議員團時表示的那樣，在中國「教訓」越南時，「我們對美國政府的立場和表明的態度是滿意的，就是提出中國從越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就是對這個態度我們滿意。只要美國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繼續採取這個立場，這就是美國對柬埔寨的支持」<sup>⑤</sup>。自然，美國雖非出於本意支持中國「教訓」越南，但其行為有利於中國從容對越開展「懲罰」行動，實現自己的目標。

### 註釋

① 國外學界具代表性的成果包括：Bruce Burton, "Contending Explanations of the 1979 Sino-Vietnamese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34, no. 4 (1979): 699-722; Harlan W. Jencks,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19, no. 8 (1979): 801-15; Eugene K. Lawson, "China's Vietnam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A Com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8 (December 1981): 691-93; Robert S. Ross,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The Politics of Alliance Termination"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4); 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Vietnam”,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3 (2010): 3-29;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A Re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4 (December 2005): 851-74。國內學界直接以「對越自衛反擊戰」為研究對象的著述很少，如閔力：《中越戰爭十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薛力、李驍：〈中越邊境戰爭：原因探析與中方收益評估〉，《戰略決策研究》，2015年第2期，頁67-83。更多的則散布於中越關係史或中國軍事史等著述之中，代表性的成果有韓懷智等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658-86；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166-84，等等。以上這些國內外著述雖間或涉及卡特政府對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態度，但並未深入分析卡特政府在整個戰爭中不同階段的目標、決策及其實施等。

②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99;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277.

③ 宮力：〈對越自衛反擊戰過程中的中美蘇三角關係〉，《黨史文彙》，1995年第8期，頁35-37；〈1979年中越邊境衝突中的中美蘇三角關係〉，《國際觀察》，2004年第3期，頁66-72。

④ 如關敬之和栗廣稱，萬斯(Cyrus R. Vance)在討論布盧門撒爾(Werner M. Blumenthal)訪華問題上主張「取消」布盧門撒爾訪華計劃。參見關敬之、栗廣：〈從最新解密檔案看美國對一九七九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立場〉，《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1期，頁33-46。這與我們對現有檔案的解讀不一致（詳見下文）。

⑤ David P. Nickles,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Melissa J. Taylor,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David P. Nickles and Melissa J. Taylor,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7). 以下引用簡稱FRUS並註明卷次。

⑥ 《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頁168。

⑦ 牛軍：〈「聯盟與戰爭」：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及其後果〉，《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6期，頁69-92。

⑧ 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Vietnam”, 14.

⑨ “Interagenc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Sino-Soviet Competition in Indochina” (14 December 1978),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以下簡稱DNSA), <https://nsarchive.gwu.edu/digital-national-security-archive>, CI02118, 1.

⑩ “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ituations of Concern” (29 December 1978), DNSA, CI02126, 1, 14.

⑪ “Alert Memorandum for National Council: China-Vietnam” (5 January 1979), DNSA, CI02129, 3.

⑫ “Alert Memorandum for National Council: China-Vietnam-USSR” (19 January 1979), DNSA, CI02131, 1.

⑬ “Meeting on Indochina-China-USSR, January 25, 4:30p.m., Department of State” (25 January 1979), DNSA, CI02137, 5.

⑭⑮ “Memorandum from Fritz Ermarth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17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13-14; 714.



⑮⑯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25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20; 722.

⑰⑱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President Carter” (26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30; 731.

⑲⑳㉑㉒㉓㉔ “Department of State: Meeting on Indochina-China-USSR” (25 January 1979), DNSA, CI02137, 12; 11; 11; 11; 12; 12.

㉕㉖㉗㉘㉙㉚㉛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9 January 1979, 5-5:40p.m.),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26, 769; 766; 767; 768; 767-68; 768; 768; 769.

㉜ 最終，雙方就反對「霸權」採取了折衷的表述，即「重申反對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謀求霸權或支配別國」。參見新華社：〈聯合新聞公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報》，1979年2月2日，第1版。

㉝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26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26; *FRUS, 1977-1980*,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55.

㉞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9 January 1979, 10:40a.m.-12:30p.m.),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47.

㉟ “Oral Presentation by President Carter to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30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70-71.

㊱㊲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30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71; 772.

㊳ White House,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from Zbigniew Brzezinski Regarding a U.S. Plan of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6 February 1979),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以下簡稱USDDO), [www.gale.com/intl/c/us-declassified-documents-online](http://www.gale.com/intl/c/us-declassified-documents-online), CK2349155974, 1-2.

㊴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3), 194.

㊵ “Oral Message from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to President Carter” (n.d.),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92.

㊶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aron) 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Holbrooke) to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Liaison Office in China (Roy)” (16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802.

㊷㊸ “Record of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16 February 1979, 4:30-5:15p.m.),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797; 797-98.

㊹ “We Are Opposed to Both the Vietnamese Invasion of Cambodia and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Document 595),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77-198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83), 1106.

㊺㊻㊼㊽㊾ “Minutes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17 February 1979, 10:30a.m.-12:20p.m.),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803; 805; 803; 804; 804.

㊿ Bernard Gwertzman, “Soviet Is Cautioned”, *The New York Times*, 18 February 1979, 1.

㉑ “Message from President Carter to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Brezhnev” (17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514-15.

㉒ “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18 February 1979, 9-9:35a.m.),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807.

⑤⑥ “Minutes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18 February 1979, 9-9:35a.m.), in *FRUS, 1977-1980*,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63; 164.

⑤⑦ White House, “Michel Oksenberg and William Odom Provide Zbigniew Brzezinski with the Objectives for the Speci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CC) Meeting on the Chinese-Vietnamese Conflict” (19 February 1979), USDDO, CK2349517709, 2-3.

⑤⑧⑤⑨⑥①⑥② White House, “Summary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Regarding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Topics Include: U.S. Objective in the Conflict; U.S.-Chinese Relations; UN Intervention;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Soviet Military Involvement” (19 February 1979), USDDO, CK2349159493, 1; 2-3; 2; 3; 3.

⑥③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21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811.

⑥④ 參見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18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516-17。

⑥⑤ “Oral Message from the U.S. Leadership to the Soviet Leadership” (n.d.), in *FRU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522, 523.

⑥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4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519.

⑥⑦ 參見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2 March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526。

⑥⑧ “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Monthly Warning Assessment: China” (8 March 1979), DNSA, CI02148, 3.

⑥⑨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79*, vol. 33 (New York: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1982), 281.

⑦⑩ “Call for an End to Fighting in Kampuchea and Vietnam” (Document 596),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77-1980*, 1107.

⑦⑪ Department Of State, “Talking Points for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Meeting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Chai Tse-min Regarding the Vietnamese Invasion of Cambodia and Chinese Actions in Vietnam”, USDDO, CK2349468165, 1-2. 檔案沒有明確標註時間：之所以確定談話是在2月20日進行的，是因為其中有一份談話草稿文件提及萬斯與柴澤民在20日舉行會談。

⑦⑫ “Alert Memorandum for National Council: Memorandum for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Warning: Update of Monthly Warning Assessment: China” (26 February 1979), DNSA, CI02145, 1.

⑦⑬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fo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Michael Blumenthal Summarizes the Purpose for Blumenthal’s Trip to China: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Normal Economic Relations; to Make U.S. Views Known Concerning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to Represent the U.S. at the 3/1 Ceremonies Elevating the U.S. Liaison Office to Embassy Status in Peking” (n.d.), USDDO, CK2349157248, 1-2.

⑦⑭ “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1 March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816, n.2.

⑦⑮ 轉引自宮力：〈1979年中越邊境衝突中的美中蘇三角關係〉，頁70-71。

李桂峰 臨沂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薛鵬程 中共廈門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講師